

“우리 [uri]” “我里” 渊源考

杨 茜 孙金秋*

[提要] 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우리 [uri]”与汉语南方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我里”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我们认为这种相似性是受中原汉语影响的吴越语向四周扩散的结果,扩散的载体是到达朝鲜半岛的吴越移民。可以说朝鲜语“우리 [uri]”与现代汉语南方方言“我里”有共同来源。

[关键词] “우리 [uri]” “我里” 吴越语 底层 波形扩散

一 引言

朝鲜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观点“是目前在探讨朝鲜语属系问题的诸多观点中影响最大、较具说服力的一种”(金永寿、金莉娜 2015:1),但是朝鲜语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仍有较多不对应的情况,其中之一即为人称代词不对应。최범훈(1993:45-46)从语音方面比较了朝鲜语与阿尔泰诸语言的人称代词,认为二者具有显著差异:“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土耳其语的人称代词都以 /b/ 或 /s/ 开头,而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都以辅音 /n/ 开头”(金永寿、金莉娜 2015:4)。H. A. 巴斯卡科夫(2004:71)对阿尔泰诸语言进行分析后指出,“各阿尔泰语言中,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复数人称代词都是按同一模式形成的:代表相应人称的人称代词成分+复数构形成分”。相较而言,朝鲜语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却不是严格按照这一模式生成,尤其是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构成与第一人称单数毫无关联。

这种不对应问题单纯依靠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解释比较困难,因此本文结合“语言底层”理论^①、“波形扩散”说^②以及汉语方言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交流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对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③”的来源进行探讨,试图据此为解释朝鲜语人称代词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人称代词不对应的情况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 通讯作者,西安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电子邮箱:2541645100@qq.com。

^① B. H. 鲍尔科夫斯基等(2013:2)认为“语言底层”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战胜”语言中所吸收的“战败”语言的成分。赵杰(2007:44)在论证朝鲜语与汉语的关系时,进一步阐发了“语言底层”的概念,即“另一种语言(通常是别的语系)的民族或族群因种种原因迁徙到新地,逐渐入乡随俗,把带进语融进了当地人的固有语言中去,但移民带来的语言(特别是词汇)还或多或少地保留在新家乡的主体语言中的现象。”

^② 19世纪的学者施密特首先提出使用“波浪说”解释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认为一种语言的影响以波纹形式向四面八方移动(刘润清 2018:68)。桥本万太郎(1985:29)在论述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时提到:人类语言发展有“谱系发展”的一面,也存在“波形扩散”的一面;“波形扩散”是“区域语言学”关注的核心,“扩散”是与“演变”相对立的概念,“扩散”的对象主要是某一区域之中超越语言差别的语言特征。

^③ 本文现代朝鲜语标音主要参照金永寿、金莉娜(2015),个别有调整;近代及以前时期朝鲜语标音参照 이기문、이호권(2008)。

二 “우리 [uri]” 来源诸论及评析

1443年,世宗大王创制“训民正音”,即“谚文”^①。从此之后,朝鲜半岛开始出现谚文标记的文献。关于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最早的谚文记录出现于15世纪的《龙飞御天歌》^②。由于缺乏更早时期的文字材料,所以一直以来关于“우리 [uri]”来源的探讨不多,主要有“篱笆说”“方向说”“词汇群说”等。

(一) 关于“우리 [uri]”来源的观点

关于“우리 [uri]”的来源,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 “篱笆说”

据《词源辞典》(安玉奎 1989:445),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代词“우리 [uri]”源自于“篱笆”义名词“울 [ul] (울타리 [ulthari])”,其人称代词用法是从表示“围绕物体边缘的部分、范围、周长”之类的意义逐渐抽象而来,最终演变为表示“连带自身在内的一个团体的人”。황병순 (1996)也指出“우리 [uri]”的形成是由表示“篱笆”的“울 [ul]”后接词缀“이 [i]”而来。

2. “方向说”

조승복 (1986)以《汉书》和《后汉书》中的“右渠”、《三国志·魏志》中的“右渠、位居、牛加”为依据,构拟了古代朝鲜语“우가 [u·ka]、위가 [wi·ka]”的语音形式^③,认为其中的“우 [u]”如同“우물 [umul] (水井)、윗집 [ys tsip] (楼上邻居)”中的“우 [u]”一样具有“向内”义;而“우리 [uri]”正是在这个具有“向内”义的“우 [u]”后添加了如同“이리 [iri]”中表示方向的“이 [i]”而来的(转引自김성남 2006:14 注释1)。

3. “词汇群说”

서정범 (2003)认为,朝鲜语固有名词代词“우리 [uri]”刚开始用作第一人称单数,后来用作第一人称复数,其词根是“울 [ul]”,这个词根与词根“얼 [əl]、알 [al]”同源,都表示“人”,而且与日语表示“人”的词根“ar, or”,蒙古语表示“人”的词根“ul, ol”也同源,这些词构成一个“同系词汇群”。

(二) 对“우리 [uri]”来源诸论的评析

以上观点对于“우리 [uri]”来源的探讨具有积极意义,但都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我们首先分析“篱笆说”。从文献资料的时间上来看,“篱笆”义的“울 [ul]”和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的谚文记录最早都出现于15世纪的文献中,很难直接断定二者产生的年代孰早孰晚,因而更无法说明“우리 [uri]”一定源自于“울 [ul]”。此外,“篱笆说”虽为部分学者所接受,但至今尚未有人对“우리 [uri]”源自于表示“篱笆”义的“울 [ul]”这一演变过程作出比较充分的论证。

^① 《世宗实录》(卷102,世宗25年12月)记载“是月上亲制谚文二十八字 其字仿古篆……是谓训民正音”;世宗28年刊行的《训民正音》解例本末“郑麟趾序文”中记载“癸亥冬 我殿下创制正音二十八字 略揭例义以示之 名曰训民正音 象形而字仿古篆”(이기문、이호권 2008:60-61)。

^② 15世纪的朝鲜文献《龙飞御天歌》是第一篇谚文书写的长篇叙事诗。其中首见谚文标注的“uri”: uri 始祖(sitso) i 庆兴(kyŏnghŏng) əy sarŏ sya 王业(waŋəp) il yŏrisini。

^③ 二词的拟音为原文使用的形式,“·”用以间隔两个音节。

再看“方向说”。该观点为建立于拟音之上的推测。但是没有更多的资料支持“우 [u]”一定表示“向内”义。即使“우 [u]”有“向内”之义，其后再加一个表示方向的“이 [i]”，构成“위 [y]”，这样的构词方式也少见。且“위 [y]”如何演变为“우리 [uri]”则更难解释。

“词汇群说”从语言属系的角度探索“우리 [uri]”的来源，但是限于史料，很难作出定论。此外，李丹（2017）提到朝鲜族先民自古以种植水稻为生，水稻种植需要协作而且不易迁移，因此形成了村落命运共同体。那么人们对于集体的认识或先于个人。由此，很难断定“우리 [uri]”在一开始是指第一人称单数，而后变为指复数。

以上观点主要是从语言内部对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的来源作出解释，但论证仍有不足。因此，本文结合朝鲜语、古代汉语^①、汉语方言资料以及中国与朝鲜半岛交流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尝试从新的视角探讨“우리 [uri]”的来源。

三 “우리 [uri]”与“我里”

在考察了现代汉语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表达形式后，我们发现中国南方地区一些方言点使用“我里”^②或者与“我里”语音近似的词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我里”这一形式与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在语音、功能、语义等方面体现出相似性。

（一）语音形式

我们将使用“我里”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现代汉语南方方言点及“我里”的语音形式整理如表1^③。

表1 现代汉语部分南方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用词及语音对照表

方言点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	语音
吴语点	海门	我俚	ɦɿ li
	常熟	我俚	ŋou li
	昆山	我里	ŋou li
	无锡	我里	ŋou li
	崇明	我里	ɦɿ li
赣语点	芦溪	我俚	ŋɔ li
	萍乡	我俚	ŋɔ li
	平江	我俚	ŋo li
	浏阳	我俚	ŋo li

^① 古代汉语拟音参照郭锡良（2010）。

^② 不同方言标注“我里”的“里”音用字不同，本文以“里”赅其他形式。

^③ 表1以陈山青（2011）第121页表格为基础添加整理而成。其中，吴语点海门话语音形式参考袁勃（1997），崇明话语音形式参考张惠英（1993），其余吴语点语音形式参考赵元任（2017）；赣语点语音形式参考刘纶鑫（2008）、魏钢强（1998）、夏剑钦（1998）、朱道明（2009）；湘语点汨罗话语音形式参考陈山青（2011），其他湘语点语音形式参考伍云姬（2009）。其中赵元任（2017）原文使用罗马字标音，同时给出了罗马字对应音标，本文根据其所给音标将原文罗马字形式改为音标形式。由于本文讨论与声调无涉，且各方言文献中声调标注方式不一，表1中现代汉语南方方言语音形式均不标注声调。

湘语点	湘阴	我里	ŋɔ li
	岳阳	我哩	ŋo ni
	邵东（火厂坪镇）	我哩	ŋo li
	隆回	我哩	ŋo ni
	桂阳	我俚	ŋo liae
	新化	我俚	o li
	汨罗	我俚	o li

如表 1 所示，以上汉语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语音形式相近，在地理上呈现长江以南“吴语—赣语—湘语”的连续分布。除湘语新化、汨罗点第一个音节为零声母外，其他语言点第一个音节的声母均为 η ^①。这些语音形式与现代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的语音相似，而湘语新化、汨罗点的 o li 与朝鲜语的“우리 [uri]”语音更接近。除了从现代汉语方言中可见“我里”与“우리 [uri]”语音相近之外，早期的方言材料也可提供一些线索。我们将《明清吴语词典》（石汝杰、宫田一郎 2005:634、641、642）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作了整理，如下：

表 2 明清吴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分类表

“我/吾” + “里”	“我” + 非“里”
我里/我俚/我哩/我侬 ^② /吾里/吾俚/吾哩/唔里/唔哩	我家/我答/我龘

从表 2 看，明清吴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表达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我/吾’ + ‘里’”类及“‘我’ + 非‘里’”类。第一类与表 1 所示现代汉语方言的表达方式非常接近，但形式复杂，主要体现为“我”“吾”两种形式共现。从语音上来看，共现原因主要是中古以前，二者的读音接近^③。上古时期“我”为“疑母歌部 *ŋa”，“吾”为“疑母鱼部 *ŋa”，二者声母相同，韵母相近。中古时期，二者在通语中显现出读音的差别，“我”为 *ŋa（疑母哿韵），“吾”为 *ŋu（疑母模韵）。根据《明清吴语词典》书末附录的“（现代）苏州方言同音字表”，“我里”的读音为 $\eta\text{əu}^6 \text{li}^6$ ，“吾里”的读音为 $\eta\text{əu}^2 \text{li}^6$ ，“我”与“吾”只是声调之别。可见虽然通语中“我/吾”音韵有别，但在吴语中无差。

由于吴语资料有限，我们无法确知吴语“我/吾”二字更早时期的读音，但结合表 1、表 2 的吴语语音，以及“我/吾”二字的上古语音来看，“我/吾”二字的读音在吴语中应当始终差别不大。据此，我们推测明清吴语“我里”的读音或大致同于现代苏州方言的 $\eta\text{əu} \text{li}$ 。这一

^① 相较于其他方言点的第一音节，吴语海门、崇明点的第一音节没有元音，但都含有自成音节鼻音 η 。据王力（2010:626），自成音节鼻音的形成主要是 $[\eta]$ 与 $[u]$ 的发音部位相同，受 $[u]$ 的影响元音化了，同时元音 $[u]$ 脱落而成。因此，本文也将海门、崇明点的第一音节视作声母为 η - 的音节。

^② 根据游汝杰（1995），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第一人称复数“我侬”或“侬”都源于“我俚”。故而本文此处将“我侬”归为“里”类。

^③ 朱红（2010）从语义焦点分析“我”“吾”的历史关系，认为上古时期的“吾”是从“我”分化而来，“吾”与“我”之间的差别主要为轻重音的差别，并提到俞敏（1949）从梵汉对音的角度也证明了后汉三国时期“歌”“鱼”两部已经混用。

语音形式与朝鲜语“우리 [uri]”读音接近；文字形式“‘吾’+‘里’”与均如乡歌^①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吾里”完全一致。这或进一步说明二者在明清甚至更早时期关系密切。

(二) 语法功能

从语法功能上看，现代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可以用作主语、宾语、定语，其中用作主语和定语的情况居多。例如：

- (1) 우리는 꼭 다시 만나게 될 거야.^②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uri-nun kkok tasi mannake tøl kəja.
我们-话题标记 一定 再次 见面 成-终结词尾

- (2) 시간 나면 언제 우리 집에 한번 들르세요. 有时间顺便来趟我家吧。

sikan na-mjøn əntse uri tsip-e hanpən tulru-sejo.
时间 有-接续词尾 随时 我们 家-位格 一次 顺便来-终结词尾

- (3) 우리 어머니께서 주무신다. 我妈妈睡了。

uri əməni-kkesə tsumusi-nta.
我们 妈妈-主格(敬) 就寝-终结词尾

例(1)“우리 [uri]”作主语，例(2)(3)“우리 [uri]”作定语，作定语时“우리 [uri]”无须借助结构助词，直接与其后的名词构成领属关系，但其后的名词往往限于集体名词和指人名词，指人名词以亲属称谓名词为常。与亲属称谓名词构成领属关系时，“우리 [uri]”表单数义，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我(的)”。如例(2)中的“집 [tsip]”指“家”，是家庭成员共有的集体；例(3)“우리 어머니 [uri əməni]”指“我妈妈”，表单数义。

汉语南方方言中“我里”的语法功能与现代朝鲜语“우리 [uri]”基本相同，在句子中主要作主语和定语。作定语时，“我里”后不添加结构助词，直接与被修饰的名词连接，构成领属关系。这些被修饰的名词同样以集体名词和指人名词为主。与亲属称谓名词构成领属关系时，“我里”等也表示单数义。例如(陈山青 2011)：

- (4) 我里是自家人(我们是自家人)。
(5) 我俚老妹考起得大学(我妹妹考上了大学)。
(6) 我里学堂(我们(的)学堂)

例(4)－(6)中的“我里/我俚”都可以直接翻译为现代朝鲜语的“우리 [uri]”。例(4)中的“我里”作主语。例(5)(6)中的“我俚”“我里”作定语。例(5)“我俚”后无需加结构助词，且表单数。例(6)“我里”后的“学堂”则是学生们共同的集体。

明清吴语“我里/吾里”与“우리 [uri]”在语法功能方面也呈现出一致性。例如：

- (7) 阿呀，东北角上起仔阵头哉，吾里散吧。(《珍珠塔》13回，引自石汝杰、宫田一郎 2005:641)
(8) 姐听情哥拍面来，再吃我里亲夫看见子了两分开。(《山歌》卷1第三首第一句，引自冯梦龙 2000:11)

^① “均如乡歌”为高丽初期僧人如采用乡札标记法所作的佛教赞歌，共11首。其中首次出现了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吾里”一词：吾里心音水清等(《请佛住世歌》，转引自김완진 2016:188，第9行)。

^② 例(1)(2)(3)及下文例(10)引自韩国“국립국어원”网站的“우리말샘”词典，网址如下：https://opendict.korean.go.kr/search/searchResult?focus_name_top=query&query=%EC%9A%B0%EB%A6%AC。例(9)转引自김성남(2006:69)。

(9) 우리는 다 부텃 아들 곤호니. 我等皆似佛子。(〈월인석보 13:32〉 1459)

uri-nan ta puthyə-s atal kətho-ni.
我们-话题标记 都 佛祖-属格 儿子 像-终结词尾

(10) 우리 父母를 畏하애니라. 畏我父母。(〈시언 4:14 나 > 1613)

uri pumo-ril turyəwəhə-yaynira.
我们 父母-宾格 害怕-终结词尾

例(7)(8)中的“我里/吾里”与现代朝鲜语的“우리 [uri]”完全对应。例(7)中“吾里”与例(9)中的“우리 [uri]”为主语。例(8)中的“我里”及例(10)中的“우리 [uri]”为定语，其后均不加结构助词，直接与亲属称谓名词构成领属关系，表单数。由此可见，明清吴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我里/吾里”与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在语法功能上也基本一致。

(三) 语义特征

从语义及使用上来看，我们整理了《标准国语大词典》(표준국어대사전)、《延世韩国语词典》(연세 현대 한국어사전)^①等韩国通用词典中对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우리 [uri]”语义和用法的解释，同时参考目前相关学者关于“우리 [uri]”的研究成果^②，概括出有关“우리 [uri]”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关注点：第一个是“우리 [uri]”体现的排除性和包括性，第二个是“우리 [uri]”体现“集体意识”。

就“排除性和包括性”来看，“우리 [uri]”根据语境不同，既可以体现排除性，也可以体现包括性。“集体意识”主要体现在说话人使用“우리 [uri]”作定语时，表现出自身和指称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

指称家庭成员的时候，朝鲜语中一般使用复数形式“우리 [uri]”表示单数意义“我(的)”，体现出家庭成员之间形成的紧密团体，是“集体意识”最显著的体现，如：“우리 아버지 [uri apətsi] (我爸爸)”；“우리 어머니 [uri əməni] (我妈妈)”。正是因为指称家庭成员时多用“우리 [uri]”，因而当指称非家庭成员的人或集体时使用“우리 [uri]”往往也体现出说话者对指称对象的亲近感，如：“우리 사장님 [uri satsəŋnim] (我们社长)”；“우리 반 [uri pan] (我们班)”。

参照以上两点来看，汉语南方方言中“我里”的语义情况与“우리 [uri]”一致。例(4)中的“我里”可以根据语境的不同体现包括性和排除性；例(5)以复数形式的“我俚”表示单数意义“我(的)”，体现出说话人与家人“老妹”之间的亲密关系；例(6)中的“我里”体现出说话人对“学堂”这一集体的归属感。这样的“集体意识”在明清吴语“我里/吾里”中也有一致体现。

^① 本文参引的两部词典均为网络版，具体网址为：<https://stdict.korean.go.kr/m/search/searchResult.do>；<https://ilis.yonsei.ac.kr/dic/?keyword=%EC%9A%B0%EB%A6%AC>。

^② 이기문 (1978) 认为“우리 [uri]”并不表示两个以上的第一人称单数“나 [na]”，而表示“나 [na]”和其他人的集合，这个集合中也可以包括听者；同时，还提出阿尔泰语系中的很多语言表示包括性和排除性时使用不同形态，并据此推测很可能“우리 [uri]”在更早时期也具有包括性和排除性的不同形态。황병순 (1996) 从语义方面对“우리 [uri]”的所指进行概括，认为“우리 [uri]”的复数意义来自于“集团”义，并说明在不同的语境下“우리 [uri]”的所指既可以包含听者，也可以不包含。李丹 (2017) 从儒家“和”文化的角度说明“우리 [uri]”具有“集团意识”，认为“和”激发了集团成员的“合力”，使得集团成员具有集体归属感。因此，“우리 [uri]”和集体名词连用时，指代包括自己在内的群体集团，但在体现群体性的同时，也具有排他性（区别于第三方或听话人所处的集团）。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使用“集体意识”这一概念。

结合以上材料来看,汉语南方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里”的语音、语法功能、语义等都与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这样多方面的一致绝非偶然,我们尝试从历史的角度探寻二者的渊源。

四 “我里”的起源与留存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没有“我里”,但是这一形式却存在于汉语南方方言之中,并用作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梅祖麟(2004)认为,“汉语南北方言指代词的主要差别在于北方是近代的,南方是古代的”。因此,我们推测“我里”集中出现于汉语南方方言中或与古代汉语相关。

(一)“我里”的起源

古代汉语资料中记录的“我里”最早可以上溯至春秋时代。

(11)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诗经·郑风·将仲子》)

例(11)中的“我里”为“我家”之义,其中的“里”即为“所居之处”。按《周礼注疏·地官司徒下》“载师”条:“里,居也。”由此可知,“我里”是由第一人称代词“我”与表示居所的“里”构成。

此外,“里”还用作行政单位,《尔雅·释言》(郭璞 2011:17)中记载:“里,邑也。”《周礼注疏·地官司徒下》“遂人”条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鄩,五鄩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虽然此处的“里”是行政单位,但仍是人所聚居之处,且居住之人不是一人或一家,而是邻里一众人等。按照“五家一邻,五邻一里”的说法,“一里”有25家,即便按一家3口计算,“一里”也当有75人左右。在那个人口并不算密集的时代,近百人的聚居地已算是村落,故而后人的作品当中也多以“我里”称代“我乡”,例如:

(12)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杜甫《无家别》)

可见,无论是“我家”还是“我乡”所表示的都是包含“我”在内的一众人,其意义与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意义一致。然而,“我里”这一形式之后在汉语通语中并没有成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推测“我里”在通语中没有用作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原因是受到了第一人称代词“我”的影响。“我”最早出现于殷商的甲骨文,用作复数,其后直至东汉汉译佛经出现之前,“我”都是一个单复数同形的人称代词。例如:

(13) 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史记·项羽本纪》)

(14) 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史记·伍子胥列传》)

例(13)中“我”指陈婴之母,指称单数;例(14)中“我”指伍子胥及其兄长伍尚,指称复数。可见,“我”自身能够承担表达复数意义的功能,无需添加更多表示复数意义的成分。已经惯用这一语言的人会根据语境等外部条件区分第一人称代词“我”所表达的单复数义,因此阻断了具有复数义的词组“我里”在通语中发展成为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可能性。

(二)“我里”的留存

如前所述,关于“我里”的文字记录最早出现于《诗经》,而文字记录一般晚于语言,也就是说在《诗经》中出现“我里”之前,“我里”应当已经存在于中原汉语口语。据此我们推测,“我里”传入南方的时间应早于《诗经》时期,或可能在周朝前后。当时南方居住的主要是“百越”族群,其历史活动范围覆盖了表1所示的“湘、赣、吴”方言区,因此大致可推测“我里”始传入南方的这一时期在这三地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古越语”。

历史上，周朝与位于东部沿海的“吴越”^①接触非常早。据史料记载^②：周太王长子泰伯（即太伯）、次子仲雍为了给弟弟季历让王位，而逃到江苏无锡附近的梅里，在该地筑城并传授生产技术和文化（李新魁 1987）。吴恩培（2001）将吴越的蛮夷特征总结为“裸国”“断发文身，裸以为饰”“黑齿雕题”等，并由此说明吴越地区“其时生产力极其低下”。如此一来，太伯、仲雍所携带的“周人部落的管理方式以及周人对世界的思维习惯、道德、伦理等”（吴恩培 2001）作为先进的文化逐步渗透至吴越地区，而文化渗透的载体就是语言。

我们能够考察到的吴越地区最早的语言材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青铜器铭文（曹锦炎 2007），铭文中第一人称代词只出现了“余”和“我”，二者分工明确，“余”主要用作主语，“我”主要用作定语。可见，至迟在春秋时期，“我”已经在吴越地区使用。然而，无论是“余”还是“我”在铭文中都仅指称单数。这或许是由于器主是贵族个人，因此铭文只采用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因而未见复数记载。对此，我们尝试从古越语的角度进行探讨。

有不少学者认为现在的侗台语来自古越语（李锦芳 2002:33；倪大白 2010:11）。我们在考察了侗台语部分语言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后发现，这些语言的第一人称代词单复数形式有别，或是通过语音屈折表示单复数，如高坝侗语（石林 1986）： jau^2 （单数）， τau^1 （复数）；或是在原有第一人称单数上添加词缀，如水语临安土语（韦述启 2017）： jiu^2 （单数）， $qo^3\ diu^1$ （复数）。由此，可以推测这些语言的祖语——古越语的第一人称代词本来也有单复数相别的形式。因此，吴越语作为古越语的一支，人称代词也应单复数形式有别。那么，中原汉语单复数同形的“我”自然不符合“吴越语”的这一要求。据此，我们推测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为了习得周朝先进文化的吴越人会根据自己的语言使用习惯选择中原汉语中能够表示第一人称复数意义的形式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

战国时期虽出现过“吾侪”“吾属”之类具有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义的词组，但并不多见。后在佛经翻译^③的影响下，汉语中曾出现过如“我等”“我辈”之类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但这些形式主要出现于汉代的汉译佛经。而在此之前，汉语中能够表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义同时在形式上又能够与单数相区分的词组应是最早出现在《诗经》中的“我里”，这个词组遂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进入吴越语。

随着“我里”在“吴越语”中的使用，“我”在“吴越语”中逐渐丧失了指称复数的功能，只用作第一人称单数。这一点在明代冯梦龙整理的民歌集《山歌》中有显著的体现^④。

^① 根据张荷（1995:3、32），“吴越”指百越的分支“句吴”与“于越”。两者互为近邻，具有相近的文化和共同的语言。苑利（2005b）则认为“吴越”本是一个民族——于越，可见二者关系密切。为论述之便，本文不作细分，将“句吴”和“于越”二者合称为“吴越”。其所居地称为“吴越地区”，使用的语言称为“吴越语”。由于吴越与中原接触较早，受中原汉语影响较大，因而相较于其他百越分支语言变化快，但吴越语仍具有古越语的基本特点。

^② 《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③ 据龙国富（2008），汉译佛经中，由于翻译的缘故，第一人称代词出现了如下两个特点：第一是已明显区分单数和复数，第二是复数形式已经固定化。朱庆之（2014）认为汉语的类属名词向代词名词复数标记转变始于东汉译经，并在译经中渐渐取得合法地位，然后随着佛教的影响，进入普通汉语；从文献来看，这一变化是东晋以后的事，但口语中接受的时代会更早一点，口语和书面语的共同接受，成为唐代以降进一步发生“形式虚化”的基础。

^④ 据吴林娟（2005）统计：《山歌》中“我”共出现 456 次，除个别表示复数之外，其余全部用作单数；“我里”共出现 38 次，全部用作复数。

五 “我里”的扩散

根据语言“波形扩散”理论，一种语言的某些特点会以该语言使用群体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进而影响到其他群体的语言。如前文所述，汉语南方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里”与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相似，结合吴越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我们推测这一相似性或源于吴越语“我里”向周边的扩散。

（一）“我里”进入朝鲜语

赵杰（2007:44）认为“上古（或远古）时期，朝鲜半岛上至少有非阿尔泰语系的另外两种语系语言的进入，这种进入的特点是移民带进异族语言，充实了上古以前原朝鲜半岛上音节简单、无复辅音、无闭音节尾的土著语”，因而，“朝鲜语正是一个存在他种语言底层的语言”。苑利（2005a, 2005b）从人名、地名、族名、稻作文化、纺织品、青铜文化等诸方面论述了朝鲜语词汇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吴越语。而类似稻作的农耕基本词，在远古、上古时期“很可能是随着移民的迁入而带进去的”（赵杰 2007:45）。可见，吴越地区与朝鲜半岛接触的时间很早。近些年，有关中国与朝鲜半岛交流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吴越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早期接触提供一定的证据。千勇（2014:379、388）认为，中国江南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流不会晚于青铜器时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无论是支石墓还是稻作农业，都说明中国江南沿海和朝鲜半岛之间在先秦时代存在着海上交往的关系。这种交往最可能的路线是江南和朝鲜半岛之间的直航”。结合以上，我们推测“吴越语”的“我里”被早期吴越移民带到朝鲜半岛，扎根之后逐渐成为了朝鲜语中的吴越语底层词。

此外，从语系归属上来看，H. A. 巴斯卡科夫（2004:70）提到兰司铁为突厥语、蒙古语和满一通古斯语构拟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为“bi-, mi- + 复数附加成分（包括 -z、-an、-ta、-in）”，由此来看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无论是构词方式还是语音形式都与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有很大区别。这样的区别说明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可能有其他来源。根据前文对“我里”与“우리 [uri]”相似性所作分析，以及吴越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早期交往，我们进一步推测朝鲜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源自其吴越语底层的“我里”。

由于“我里”在较早时期由吴越地区传播到朝鲜半岛，根据“我里”的上古语音，我们推测“我里”进入朝鲜半岛时的读音为 *ŋa liə。这一语音形式进入朝鲜半岛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跟随朝鲜语的语音系统及语音演变逐步发生改变。

先来看 *ŋa 在朝鲜语中的发展。《训民正音》谚解本（韩国国立国语院 2008:4b）对于辅音“ㅇ”的描述为“如业字初发声”，即其语音相当于“业”字的声母。结合汉语语音来看，“业”的声母为“疑母”，与“我”的声母一致。“制字解”中“业”的谚文形式为“업”，即 [ŋəp]，但是现代朝鲜语中该词的语音为 [əp]，也就是说辅音 ŋ 脱落了。朝鲜语学界一般认为 ŋ 的脱落与语言特点及朝鲜语使用者的习惯有关。백두현（2014）认为“由于 ŋ 在词头发音困难，因此在很多语言中 ŋ 都不出现于第一音节的词头”。即使在《训民正音》解例本（韩国国立国语院 2008:28b）“用字例”所给例词中，ŋ 也只用作非第一音节的声母，如：러울 [rəŋul] “獭”、서에 [səŋəy] “流涎”。由于“ŋ 位于音节开端的发音方式不符合朝鲜语使用者的习惯，最终与零声母完全合流了”（김조경 2019:12）。由此，我们推测 *ŋa 在朝鲜语中很可能经历过同样的音节首辅音 ŋ 的脱落。此外，根据 이기문、이호권（2008），朝鲜语元音系统从古

代朝鲜语时期至中世纪朝鲜语时期发生了大推移，整体体现出元音后高化特征。因此，我们推测 *ŋa 也同样经历过元音后高化过程。

再看 *liə 在朝鲜语中的发展。朝鲜语谚文字母“ㄹ [r/l]”对应古代汉语的“来”母，也即现代汉语的辅音 [l]；只是当“ㄹ [r/l]”位于音节首时作 [r]，位于音节尾时作 [l]。由于朝鲜语关于元音发展的语料和研究都比较少，因此很难断定 *liə 的元音在朝鲜语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但是从谚文的创制记录可以作一点粗略的推测。《训民正音》谚解本（韩国国立国语院 2008:9b）对于谚文字母“ㅣ [i]”的解释为“如侵字中声”，也就是说“ㅣ [i]”与汉字“侵”的元音一致。上古时期中原汉语“侵”的元音为 [iə]，与“里”的元音相同。且从上古至明代，“侵”的元音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由此，我们推测，朝鲜语以“侵”的元音解释“ㅣ [i]”，很可能是由于隋唐以前汉语通语中没有音值为 [i] 的音，[iə] 与 [i] 接近，因而在朝鲜语中一直被用以与 [i] 对应。因此，*liə 进入朝鲜语后，也就顺应朝鲜语的语音系统变为了 ri。

（二）“我里”进入汉语南方方言

张光宇（1994）认为“从崇明岛沿江上溯，可以发现长江沿岸的方言具有不少共通的特点”。通过表 1 所示的方言点来看，使用“我里”也属于这些方言“共通”的特点之一。但是这样的特点很难说是三种方言同时各自发展而来的结果，更可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尝试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作出推测。

历史上，东周时期吴越与楚曾多次在今江西一带发生战争，吴越的影响逐渐进入江西。此外，江西出土过很多与吴越地区特征一致的瓷器，据考证这些瓷器都是吴越地区制造（刘诗中、许智范 1982）。可见吴越地区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先进程度要高于其西部地区，因此，文化的输出方向应为由吴越向江西一带。

据史料记载，西周时百越的活动范围已很广，其中一支扬越已达今汉江以南^①。至春秋中期以前，扬越的活动范围大致覆盖湘、赣地区^②，因而这两地早期语言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与古越语形式也应相去不远。由此，我们推测现在湘语、赣语与吴越语相同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我里”，是通过语言接触而来的。历史上，湘、赣地区自春秋时逐渐为楚国所统，其“我里”或可能来自楚语。然而，据尹喜艳、邵慧君（2013）对《楚辞》中战国时期作家作品和楚地出土战国简册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研究来看，战国时期楚语常用第一人称代词为“余（予）”，共出现 110 次，其中 50 次作定语，而“我”仅出现 20 次，3 次作定语。可见，至少在战国时期，“我”在楚语中是一个弱势第一人称代词，第一人称代词的功能主要由“余”承担。此外，“余”有用作复数的情况，如“吴光争国，久余是胜”（《楚辞·天问》）。其中的“余”表示复数，指“我们”。可见，楚语的第一人称代词或也是单复数同形。由此，我们推测湘语、赣语的“我里”并非源自楚语，而是吴越语西扩的结果。此外，三国时期东吴控制了原楚国东南的大部分地区，这也使吴越语“我里”向湘、赣西扩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综上，我们结合“波形扩散”理论，将“我里”从中原至吴越地区，再从吴越地区至四周的扩散图示如下：

^① 《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夷王时，楚王熊渠“伐庸、杨粤，至于鄂”。“杨粤”即扬越，为百越的一支。据吴永章（1986），“庸在湖北省竹山县境，鄂则为今鄂城县境，扬越界于此两县之间，故应属汉江一带”。《吕氏春秋·恃君览》（张双棣等 2022）也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即汉水以南为百越边界。

^② 据刘礼堂（1990），扬越在春秋中期以前的聚居地大致为“今湖北英山—湖南岳阳一线以南，湖北黄梅—江西赣江流域以西，湖南资水以东，广西桂江—广东北江流域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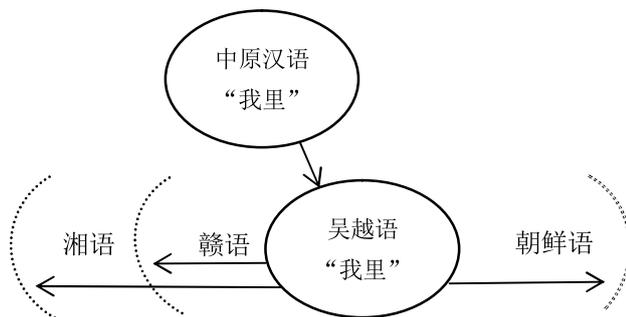


图1 “我里”扩散示意图

六 结 语

本文结合“语言底层”及“波形扩散”等理论,探讨了“我里”进入吴越地区并向朝鲜语传播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推测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与汉语南方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里”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古代汉语早期,“我里”是表示“我”和“居所”的两个实义词,可拟音为 *ŋa liə。随着中原与吴越地区的接触,“我里”被吴越地区语言借用作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又经由吴越移民传播到朝鲜半岛。因此,无论是汉语南方方言第一人称复数“我里”,还是朝鲜语第一人称复数“우리 [uri]”,都含有“连‘我’在内的一众人”之义,且都可以复数用作单数,以示“集体意识”。随着“我里”进入朝鲜语,其语音 *ŋa liə 也随着朝鲜语语音系统及其演变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现在的“우리 [uri]”。

综上,我们认为朝鲜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우리 [uri]”与汉语南方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里”同源自于受中原汉语影响的吴越语“我里”。由吴越语进入朝鲜语的“我里”作为底层词融入朝鲜语。这类词语的存在,或许正是朝鲜语词汇系统与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词汇系统差异较大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安玉奎. 1989. 《词源辞典》, 延吉: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
- [2] H. A. 巴斯卡科夫. 2004. 《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 陈伟、周建奇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3] B. H. 鲍尔科夫斯基等. 2013. 《语言的底层问题》, 陈伟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 曹锦炎. 2007. 《吴越历史与考古论丛》,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5] 陈山青. 2011. 《湖南汨罗方言复数人称代词词尾“俚”的语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
- [6] 冯梦龙编辑. 2000. 《山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 [7] 郭璞. 2011. 《尔雅》,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 [8] 郭锡良. 2010. 《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9] 韩国国立国语院. 2008. 《训民正音》, 韩梅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10] 金永寿、金莉娜. 2015. 《中国境内朝鲜语使用标准研究》,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 [11] 龙国富. 2008. 《从梵汉对勘看早期翻译对译经人称代词数的影响》,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

- [12] 李 丹. 2017. 《韩国语人称代词“우리”的意识形态研究》,《东疆学刊》第2期.
- [13] 李锦芳. 2002. 《侗台语言与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
- [14] 李新魁. 1987. 《吴语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究》第5期.
- [15] 刘礼堂. 1990. 《扬越地望考》,《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
- [16] 刘纶鑫. 2008. 《芦溪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17] 刘润清. 2018. 《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8] 刘诗中、许智范. 1982. 《东周时期江西地区吴文化初探》,《江西历史文物》第2期.
- [19] 梅祖麟. 2004. 《苏州话的“唔笃”(你们)和汉代的“若属”》,《方言》第3期.
- [20] 倪大白. 2010. 《侗台语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
- [21] 千 勇. 2014. 《浙江大学古代中韩海上交流史研究评述》,载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编《韩国研究》(第十二辑)第376-390页,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 [22] 桥本万太郎. 1985. 《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3] 石 林. 1986. 《侗语代词分析》,《民族语文》第5期.
- [24] 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 2005. 《明清吴语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25] 王 力. 2010. 《汉语语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26] 韦述启. 2017. 《水语人称代词比较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
- [27] 魏钢强. 1998. 《萍乡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28] 吴恩培. 2001. 《句吴土著居民的文化特征和泰伯的“端委”以治》,《苏州大学学报》第3期..
- [29] 吴林娟. 2005. 《〈山歌〉中的人称代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 [30] 吴永章. 1986. 《楚与扬越、夷越、于越的关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
- [31] 伍云姬. 2009. 《湖南方言的代词》(修订本),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32] 夏剑钦. 1998. 《浏阳方言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33] 尹喜艳、邵慧君. 2013. 《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研究》,《海南大学学报》第5期.
- [34] 游汝杰. 1995. 《吴语里的人称代词》,载《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第32-4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35] 俞 敏. 1949. 《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i》,《燕京学报》第37期.
- [36] 袁 劲. 1997. 《海门方言志》,合肥:黄山书社.
- [37] 苑 利. 2005a. 《韩(日)语与中国东南沿海远古吴越语比较》(上),《当代韩国》夏季号.
- [38] 苑 利. 2005b. 《韩(日)语与中国东南沿海远古吴越语比较》(下),《当代韩国》秋季号.
- [39] 张光宇. 1994. 《吴语在历史上的扩散运动》,《中国语文》第6期.
- [40] 张 荷. 1995. 《吴越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41] 张惠英. 1993. 《崇明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42] 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等译注. 2022. 《吕氏春秋》(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 [43] 赵 杰. 2007. 《从日本语到维吾尔语:北方民族语言关系水平性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44] 赵元任. 2017. 《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45] 朱道明. 2009. 《平江方言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46] 朱 红. 2010. 《语义焦点与语言的历时演变——以上古汉语“我”、“吾”的分化为例》,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第134-141、1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47] 朱庆之. 2014. 《汉语名词和人称代词复数标记的产生与佛教翻译之关系》,载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

- 学报》编委会编《中国语言学报》(第十六期)第10-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48] 김성남. 2006. 국어 인칭대명사의 역사적 연구, 동의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金成男. 2006. 《国语人称代词的历史研究》, 东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9] 김조경. 2019. 韩·中汉字音声母变化比较研究, 한서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金兆京. 2019. 《韩·中汉字音声母变化比较研究》, 韩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50] 김완진. 2016. 향가해독법연구, 서울: 서울대학교출판문화원 (金完镇. 2016. 《乡歌解读法研究》, 首尔: 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
- [51] 백두현. 2014. <훈민정음> 해례의 제자론(制字论)에 대한 비판적 고찰, 어문학 123 (白斗贤. 2014. 《〈训民正音〉解例制字论的批判性考察》, 《语文学》第123期).
- [52] 서정범. 2003. 국어어원사전, 서울: 보고사 (徐廷范. 2003. 《国语语源辞典》, 汉城: 宝库社).
- [53] 이기문. 1978. 국어의 인칭대명사, 관악어문연구 3 (李基文. 1978. 《国语的人称代词》, 《冠岳语文研究》第3期).
- [54] 이기문, 이호권. 2008. 국어사, 서울: 한국방송통신대학교출판문화원 (李基文、李浩权. 2008. 《国语史》, 首尔: 韩国放送通信大学出版文化院).
- [55] 조규태. 2010. 용비어천가(개정판), 서울: 한국문화사 (赵奎泰. 2010. 《龙飞御天歌》(修订版), 首尔: 韩国文化社).
- [56] 최범훈. 1993. 한국어발달사, 서울: 경운출판사. (崔范勋. 1993. 《韩国语发达史》, 汉城: 庆云出版社).
- [57] 황병순. 1996. 일인칭 대명사 ‘우리(들)’의 의미와 용법, 배달말 21 (黄炳顺. 1996. 《第一人称代词“我们(们)”的意义和用法》, 《民族语》第21期).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우리 [uri] and Woli 我里

YANG Xi and SUN Jinqiu

[Abstract] 우리 [uri], the first person plural pronoun in Korean, is fairly similar with *woli* 我里, the first-person plural form in the southern dialects of Chinese. We propose that this similarity results from the diffusion of the ancient Wuyue dialect of Chinese bea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ancient Central dialect of Chinese, which has been sprea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by immigrants speaking the Wuyue dialect.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우리 [uri] in the Korean language and *woli* in the southern dialects of modern Chinese share a common source.

[Keywords] 우리 [uri] *woli* 我里 Wuyue language substratum waveform spread

(通信地址: 710128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